

中国地方志浅说

朱士嘉

地方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记录，它既反映了各该行政单位的天文、气候、地形、自然资源、自然灾害以及动物、植物、水族等的生长、迁移、灭绝的过程；又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地方志历史之悠久，地域之广阔，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失为我国文化的特产。对于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史，地方志都是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一、地方志的起源和发展

地方志是在我国封建时期，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史、书、志、记、录、传、图、经等各种不同体裁的书籍逐步演变而来的一种特定体裁的著作。据周礼记载，周代已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当时诸侯各国的历史，比如：《郑志》是郑国的历史，《晋乘》是晋国的历史，《楚梲杙》是楚国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有人编写《禹贡》，扼要地记述了全国的疆域、土壤、物产、赋税和风俗等等。汉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杰出的通史，文字尔雅，体例优异，内容丰富。两千年来，陆续编写的史书，特别是官方主编的断代史，无

不以《史记》为圭臬。后来班固写了《汉书》，为地理志开创了完善的体例。这些“史”、“书”尤其是《汉书》为后来地方志的出现，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袁康、吴平等编写了《越绝书》，反映了包括现在的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建设、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等。这部书已具有地方志的雏形。之后，东汉但望编撰了《巴郡图经》。所谓图经，是包括“图”和“经”两部分，“图”指的是关于一个行政单位的疆域图，后来充实内容包括沿革图、山川图、八景图、寺观图、关隘图、海防图等等。“经”是对“图”的文字说明，兼及境界、道里、户口、职官等情况。图经的出现与军事学和绘图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这种图经在南北朝时已开始大量出现。现存最早的图经是《沙州图经》，修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可惜首尾残缺，图也不见了。从今天残存的部分看、文字简洁，叙事明爽，对于沙州的天象、苦水、渠、泽、堰、堤、驿、县学、社稷坛、杂神、寺庙、冢、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叙，其中十九个驿站是通新疆、印度和中亚细亚的必经之处，是中外交通的要隘，地位很重要，但不见于其他载籍，可补新旧《唐书》的不足。另外有《西州图经》，修于唐乾元年间（公元758—760年），残缺更甚，仅存几十行。以上两部书原存甘肃敦煌石窟，二十世纪初期被法国伯希和掠去，幸经罗振玉整理，收入《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和《敦煌石室遗书》（铅印本）。《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虽然所存无几，但其分门别类，有图有说，综合记录，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地方志体例，相当接近宋以后的地方志，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志了。宋以后的地方志就是沿着《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所代表的方向继续发展。

汉唐时期之所以出现地方志是有其具体原因的。一、汉唐之际全国各地的生产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生产门类增多，有的地方出现不少专门性产品，整个封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二、由秦开创的郡县制度已相当巩固，人们的乡土观念加强，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往往委派外地人任地方行政官吏。外来的官吏为了便于统治，需要一种比较详细的记录当地情况的资料作为参考。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需要通过此类资料来了解地方的情况。所以唐代规定全国各州各府每三年或五年给尚书省兵部职方造送图经一次。三、汉唐时期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学、历史学等各门学科都有杰出的成就，《史通》的作者刘知几，《海内华夷图》的作者贾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地方志的编写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在书籍方面，出现了全国性一统志的编写，例如：晋挚虞的《畿服经》（170卷），隋代的《隋区域图志》（129卷），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40卷），这些都是当时有名的一统志。此外，自隋、唐以来专记一地一事一物之书，如山志、水志、人物志、风俗志、图志、物产志、寺观志等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涌现出来。这些书在内容与体裁上都给地方志的编写以程度不同的影响，而地方志反过来又促进了一统志和区域性专著编写。

到了宋元时期，地方志的编写可以说进入成熟阶段，流传至今的有三十多部。最著名的有《咸淳临安志》、《四明六志》等。宋以前的地方志跳不出地理书范畴，到了宋代始由“地理”扩充到人文历史方面，人物志和艺文志在地方志中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概括这个时期方志的特点是：风格严谨，文字简炼，内容翔实。上承《史记》、《汉书》的余绪，下为方志编纂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明代对方志的编写更加重视，有不少著名的文人也参加方志的编纂工作。这一时期方志的特点是文字简炼，但叙述有些浮夸，内容详略不一。著名的方志有《武功志》、《朝邑志》等。

清代进入了方志的全盛时期。这时清政府对修志相当重视，在各地成立了修志局，由学正负责检查方志的好坏。这时期修的方志内容丰富，体例比较统一，著名的方志很多。如乾隆时章学诚修的《永清县志》、戴东原（戴震）修的《汾州府志》，极负盛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辑古方志的学者，例如王谟、马国翰、陈运溶等从唐宋类书中辑录了许多古方志，如三国时吴顾启期的《娄地记》等分别收入《汉唐地理书抄》、《玉函山房辑佚书》（附补编）和《麓山精舍丛书》中。另孙诒让辑录了刘宋时的《永嘉郡记》刻成单行本。其中陈运溶的贡献最大，他除辑录了上述古方志外，还辑录了南北朝湖广地区古方志四十多部。每部篇幅有限，少则几条，多则二、三十条，但还能反映各该地区的气候、地貌、土壤、水利、资源、土特产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概况。关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有所记载。陈运溶等人的辛勤劳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我们研究古方志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批学者，如乾隆时的章学诚、戴东原，嘉庆时的孙星衍、洪亮吉，以及李兆洛等人。他们除了亲自从事修志实践外，还对如何修方志的方法，作了概括，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方志编纂学。章学诚写的《修志十议》，被认为是编志书的典范。他写的《州县立志科议》，甚至对今天也还有现实意义。这些方志编纂学家对于如何修志，当然有不同的见解。章学诚写了《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记述了他与戴东原对修志的不同观点。人们称章学诚是修志的新派代表，而戴东原是旧派的代表，各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百

家争鸣的景象。

民国以后，方志编纂学继承了清代的传统，但也有所发展。余绍宋修了《龙游县志》，黄炎培修了《川沙县志》，颇负盛名。在修志理论方面，瞿宣颖写了《志例丛话》，王葆心写了《方志学发微》，黎锦熙写了《方志今议》等文，对方志编纂学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在辑录古方志方面，五六十年以来共辑录了一百多种，如鲁迅辑录了多种《会稽记》，赵万里辑录了《析津志》，张国淦辑录了《武昌记》等。他们在整理古方志资料方面，也作出了贡献。

二、地方志的特征

地方志有四个特征：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

（一）区域性。地方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记录的。现存八千多种。省有通志、府有府志，厅有厅志，其他如州、县、关、卫、所、镇等也各编有志书（至于地方志的支流，如山志、水志、湖志、堤志、塘志、园志、楼志、亭志、寺志、庙志、庵志、塔志、祠志、书院志等，尚未包括在内）。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方志都是地方官聘请当地知名人士编修的。有时下级官员担任主编，少数由私人编撰。地方官每到一个行政单位，必先了解其境界、地形、土壤、人口、物产、风俗等等，而有关这些情况通常可以从地方志中找到。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往往有编纂“断代史”、“一统志”、“类书”之举；在编纂过程中，征集各省、府、州、县志书以为参考。有时要求地方官重修地方志，选请“学正”审核、选择，转交中央礼部或内阁。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地方志一千多部，主要是编辑《四库全书》和《一统志》的时候，从各省各地征集得来的。地方志关于氏族、农谚、方言、园林、土特产、地方工艺等记载更具有鲜明的区域性。

（二）连续性。地方志的第二个特征是连续性。往往有这种情况，某一种志书创修后，每隔多少年续修一次。过去封建王朝屡次发布修志命令。除上面提到过的唐代规定全国各州各府每三年或五年给尚书省兵部职方造送图经一次外。明代永乐以后发布修志命令较多，间附修志条例，要求地方官遵行。清代康熙要求各省、府、州、县勤修志书，省志则限令六十年编修一次。例如，清雍正七年（1727年）敕各省重修通志，上诸史馆。现存清代常熟县志编修十三次之多，平均每隔二十年修志一次。这在县志中是十分罕见的。人力财力不足之区，则修志次数减少。有的仅就旧志原版某一部分，例如职官、选举，修修补补，聊以塞责。总的说来，连续编修两次三次以上的县志，数量相当大，可能达到七千部。这就为我们提供以下四个有利条件：

1. 便于了解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起义连续发生的情况。

2. 便于了解自然地理、自然灾害、气候、水文等不断变化的情况。

3. 便于了解各该地区人口的增减，物产的丰歉，动植物和水族生长、迁移、灭绝的情况。

4. 便于了解各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逐渐演变的情况。

以上四种情况，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内在联系，如果对它们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总结其规律，就能利用它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三）广泛性。地方志涉及范围很广，大致包括以下四部分资料：

1. 阶级斗争资料，包括农民起义，工人罢工，明代倭寇侵华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苛捐杂税，兵制，边防，海防等等。

2.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资料。包括农业资料以及其他方面

资料，如医药，水利，自然灾害，蔬果，林业、畜牧业，蚕业，丝织，渔业，茶业，盐政，矿冶，手工业作坊，建筑，造船，航海，印刷，贸易，交通，货币，度量衡，动植物，水族等等。

3. 宗教资料。包括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等教的建筑物及其传布的情况等。

4. 其他资料。包括科举制度，风俗，方言，农谚，历史文物，中外关系，名胜古迹等等。

地方志具有广泛性这个特征，表现在门类的庞杂，内容的丰富以及引用材料的详备，可以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单从天文这一项目来看，古代统治者设置钦天监这个天文官，负责观测和记录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极光、陨石的变化情况；各县又有所谓“阴阳生”者，负责观测和记录各种天象变化的情况。就它的广泛性来说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少有的壮举。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正在组织人力参考中国古代志书材料编写《中国天象记录总表》，出版以后将是天文学界一部重要的著作。另外，各地修志局聘请采访员编修方志，其参加人数之众，采访时间之长，采访范围之广，采访资料之丰富，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四）可靠性。如前所述，方志的编纂是为了向地方官提供参考，作为统治的一种依据。所以，一般说方志的编纂都是比较严谨的。它所依据的资料有档案，史书，家谱，诗文集，笔记，地方文献，古器物，以及测绘和采访材料等等。其中档案原存县署六科（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内中一部分可靠程度较高。例如，乾隆《威远县志》记录“兵房”所藏地契和“仓房”所藏田房诸契，非常珍贵。测绘和采访材料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因为许多情况，特别是关于工农业生产和自然灾害的情况多半是劳动人民提供的。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说：“地近则易

核，时近则迹真。”张恕同治《鄞县志序》也说：“以一方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从一般意义上说来，通志（省志）的详备程度不如府志，府志不如县志，县志不如镇志，例如，民国《法华乡志》记载徐光启的事迹比《上海县志》详细，民国《张堰志》记载顾观光的事迹比《金山县志》详细。浙江《双林镇志》对太平革命军的制度和活动之所以能写得既真实又生动，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当然也需注意到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志也存有不少浮夸、失实迷信、歪曲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污蔑等糟粕，所以具体情况还应具体分析。

三、地方志的价值

在旧社会，地方志大多数是官僚地主编修的，起着维护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作用。它对反动集团歌功颂德、隐恶扬善，对农民起义歪曲污蔑。就是在记录自然现象方面，如彗星的出现，陨石的降落等，也牵强附会地说成是“上帝”的意志，影响社会的安全和政局的变动，进行“天人感应”的说教。尽管如此，地方志仍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例如，许多地方档案原存各个行政单位，由于历年干戈扰攘，散失的百无一存，但还有不少因被地方志引用而得以保存至今，硕果仅存，倍感珍贵。

历代封建王朝利用地方志编写“断代史”、地理书、一统志、类书等，如西晋以来的地理书、一统志，唐宋以来的类书、辞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地方志资料。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引用较多，其中许多地方志原刻本已失传，但由于有一部分在这两部著述中引用，得以保存至今。上海图书馆陈光贻同志编有《古今图书集成引用地方志辑目》，可供参考。

清代顾炎武是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利用地方志资料的著名史学

家。他引用大量方志中有关地形、水利、赋役、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等资料编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目的是唤醒当局注意加强国防，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减轻人民负担。他的志愿在旧社会虽然没法实现，但他编著这部书的动机是正确的，方法是对头的，直到现在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还用方志资料编著《肇域志》，现在已经整理，不久可望出版。

在当前利用哪些方志资料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呢？个人设想以下五点，以供参考：

（一）整理研究地方志中有关自然地理、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的资料，为基本建设提供参考。

在进行水利、建筑、铁路等工程之前，必须了解所在地区的气候、地形、土壤、雨量、水文、自然资源及其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特别是地震灾害的情况，找出它的规律性，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方案，增强各种建筑物的防震抗震能力，地方志往往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湖北、湖南、江西及长江以南其他各省地方志，反映了地下宝藏包括稀有金属的名称、性能、用途及其分布的情况，如果对它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把研究成果作为勘探矿藏的线索，书本材料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就有希望找出更多的石油、天然气、煤矿、铁矿、铜矿、锡矿和稀有金属，支援工业建设。

（二）整理研究地方志中有关农业的资料，总结我国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借鉴。

如江苏省《吴县志》、《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浙江省《湖州府志》和《乌青镇志》描绘水田耕作的工具和技术，纤悉入微；浙江民国《新昌县志》附农事调查，分蚕、桑、烟、茶、术、矿六篇；光绪《于潜县志》载有耕织图四十六幅。这些资料都很珍贵，反映了劳动人民创造发明的智慧和能力。东北的

《盛京通志》，山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县志记叙农具，有图有说，为研究我国农业发展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湖北盛产棉花，又以淡水鱼著称，《武昌县志》、《江陵县志》以及其他湖北方志反映了湖北鱼类的名称、品种、繁殖、生长和活动地点等资料，也提到渔民们因地制宜地制造了多种不同的工具进行捕捞，费力小而收获大的情况。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为大幅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淡水渔业生产贡献力量。这一作法已有先例，早在四十年代，日本人就根据我国的《八闽通志》、《霞浦县志》和福建其他地方志所记载的渔业资料编写论文，刊登日本鱼类杂志，以供该国的渔业生产参考。

世界学者共推我国为温带植物最丰富之国。根据国内外学者考察采集所得，我国植物共有二三千种。根据《庐山续志稿》记载：“我国花卉园植物种类之富，世界各国罕与伦比。据爱丁堡植物园园长史密司教授之调查，英国今日之园庭植物，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产自中国。西谚谓：无中国花卉，不成庭园一语，洵非偶然，而川滇高山之杜鹃花及樱草花，经西欧各国庭园栽培的约七八百种之多，而国内罕有知之者。此类名花多数能于庐山生长，因土质与气候均甚相宜也。再则，重要药用植物，人参、厚朴、杜仲、党参、贝母、石斛等等，在庐山均有栽培成功之可能，即将为栽培之试验。”

总之，为使我国农、林、牧、付、渔得到全面发展，我国的地方志资料是有参考价值的。

（三）整理研究地方志中科学技术资料，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方志中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是很多的：

1. 关于天文方面的资料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四川巴郡人张因训创制浑

天仪，有木人能撞钟击鼓，自动报时之举。他发展了唐代张遂（一行和尚）等创制的水运浑仪，是自动记时器的先驱，比欧洲自鸣钟的发明要早好几百年，在古代科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川许多天文工作者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和排斥，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学术研究，如严君平以卖卜为生，袁天纲以挑柴叫卖为业，洛下閤是一个长期隐居于巴郡落下（地名）的普通老百姓。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南溪人名叫陈溥的因家贫不能置仪器，便以笠写天，夜悬亭中，用证星象，辄验。同治、光绪年间，在眉州，受到爱戴的民间天文学家郭宾俊是一个卖油的穷人。

明清反动王朝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实行学术垄断，严禁私习天文历学，但是民间许多天文爱好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重重障碍，埋头观察探索，取得显著成绩。例如关于极光的记载，在湖北《竹溪县志》上记载着：“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公元1862年）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饼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十年以后，即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太阳大爆发，在印度地理纬度二十七度到三十六度的七个地方和更南的孟买，都观测到极光。对这次极光，我国地方志的记载也很多，如陕西《大荔县志》、河北《东光县志》和湖北《光化县志》上都有记载。极光的研究涉及通讯、广播、空间探测、宇宙航行的空间科学，意义十分重要。

2. 关于机械学方面的资料

四川方志反映了明万历年间合江人曹震在陕北创制“代漕陆舟”，“法极精巧”，行驶榆林沙漠地带，远远超过畜力。清朝

中叶彭县唐希鼎、永川刘道煜等先后制造机器人，能运转数磨；唐氏所造之机器人，由五段组成，股臂咸备，负重则行，均不由师授。

3. 关于地理学方面的资料

方志中关于地理学方面的资料价值相当高，例如乾隆《黔滇志略》对于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十二个著名岩洞的精辟叙述，它从每个岩洞的所在位置，名称由来，从洞内顶部倒悬的石钟乳，到底部耸列的石笋、石柱都有生动的介绍。这就帮助我们了解那些厚层石灰岩的分布，由于高温多雨，受地表和地下水的不断侵蚀冲击，逐渐溶解，形成了奇峰异洞、石笋、石柱、危岩、怪石等等的地貌特征。

广东、山西一部分地方志对于气候的变化与地形的关系，作了正确的阐述。广东《新安县志》（卷二）说：“粤为炎服，多燥而少寒，三冬无雪，四时似夏，一雨成秋……西南海滨，厥土涂泥，水气上蒸，春夏淫霖，庭户流泉，衣生白醭，即秋冬之间，时多南风，而础润地湿，人肤理疏而多汗。谚曰：急脱急着，强于服药。此气候之大较也。”山西万历《潞安府志》说：“山川原隰异，而气候早晚因之，是故物产异宜也，作息异齐也。……上党山高，惟夏令不爽，冬令常侵入春秋之事，甚有入秋即霜，盛夏而雹者。试凭太行观之，中州之绿野铺茵、山中之黄芽始甲。迨夫千岩叶落，而山趾之树梢尚青。其气候之相悬盖如此，是以麦惟一熟，亦惟黍稷为宜。”

以上记载都是研究我国地理学的好材料。竺可桢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已在《何谓地理学》一文中指出：“自然地理中，地形、气候诸要素得以经纬仪寒暑表测定者无论矣；即人生地理亦何尝不可以科学方法治之。试以我国而论，各省居室建筑之形式、材料、广狭、高下各各不同，或用岩石，或用木材，或则穴土而居，或则依舟为业，此则与土壤之性质，森林之有无，雨量之多寡，气

候之温寒在在均有关系，若实地详为研究，作有系统之叙述，则其结果必为良善之地学。”（《史学与地学》第一期）

竺可桢同志提出的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直到现在好象还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如果我们能把地方志和古籍中有关资料充分整理出来，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作有系统之叙述，则一定能为我国地学的研究开辟新的途径。

（四）整理研究地方志中大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资料，如按时代按地区按人物按题目编成各种资料丛编，可为历史科学研究补充史实。

方志中有大量关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记载，例如，浙江《双林镇志》记载的太平天国革命事迹，光绪年间《雷波厅志》记载的少数民族起义的事迹，都是很珍贵的资料。此外，民国《感恩县志》记载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偷偷测绘我国地图的情况：“日本志贺氏于清季光绪年间，带其徒弟数人游历我琼州之黎峒，而绘其山川形势以归。”在《齐齐哈尔志稿》上还有沙俄武装镇压我国黑龙江义和团的罪证——修筑东清铁路图片册，等等。若把这类材料写成各种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革命历史，总结劳动人民革命斗争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是很有意义的。

（三）整理方志中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资料，编写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为促进中外友好和文化交流服务。

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许多地方志都有反映。唐代长安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陈垣、向达各有专著讨论此事。熙宁《长安志》是他们参考的重要图籍之一。从唐代开始，中国古籍、佛经、文物陆续传往日本。日本精制的铜铁器到了宋代畅销于明州（宁波）。明州设宾馆以招待日本、朝鲜客人。从中亚细亚传入中国的物产见诸方志的有：婆罗树，公元435年已在长沙

郡巴陵县发现，后传入扬州、海南岛等地，是由佛教徒引进的；菠棱菜，即菠菜，一名赤根菜，唐代已极普遍。另外又记载了汉张骞从月氏带回葡萄、石榴、核桃、芝麻、西瓜等瓜果油料作物在南北各地安家落户，茁壮成长的情况。从南洋方面传入中国的物产有：番薯（即白薯）、烟草（原名“淡巴菰”），明末传入福建，后传遍全国；棉花（草本）、菠萝蜜、洋桃、茉莉花，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良种甘蔗等等。从中国传往南洋群岛的有各种生产工具，对开发当地的资源，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较好的作用。此外晋江高甲戏（合兴戏），泉州傀儡戏也传到国外，受到海外人民的欢迎。

早在十九世纪，中国草编已经传入欧美各国。美驻济南和烟台的领事馆在报告中曾提到这一事实。现在瑞士的草编业就是在学习中国产品款式的基础上，经过改良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这些记载，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此外，利用方志编写乡土教材也是很有意义的。黎锦熙在三十年代曾建议：“学校文理各科，教材皆用乡土，例如城固而有张骞，岂但本邦之矜式，县志传述，宜供全国以资粮；又如方言一门……其最大用处，实在本邑之小学、国语一科，字读国音，词有标准，教学之际，须举土俗，比较异同；县志此门，兼供斯用。”（《方志今议》页六），这个建议值得重视。

四、地方志的收藏情况

在国内，北京图书馆首屈一指，大约有六千部；其次是上海市图书馆，大约有五千部；第三是南京图书馆，大约有四千部。以大学图书馆来说，北京大学第一，南京大学第二，北京师范大学第三。

此外，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也收藏了部分中国地方志。

在国外，日本人来我国采购方志，大约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他们中间很多人懂得中国版本，亲自采购，因此所藏数量多而质量高。我国藏书家山东聊城杨氏，浙江的陆心源皕宋楼所藏珍本方志也曾流入日本，因此日本藏我国稀见方志数量较多；有些方志我国图书馆所藏残缺不全，而日本则有足本。大约1956年以后，中国科学院向日本摄制胶卷。最近，北京图书馆也从日本复制到稀见中国方志胶卷五十种。

美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通过公使、领事、传教士、商人来中国搜集地方志。大约在清朝末年，一个山东藏书家高翰生所藏山东方志一百多部流入美国，内有珍本几部，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我在该馆工作，编写了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地方志二千九百多部，内有稀见本十几部。美国哈佛大学早在三十年代已购置中国地方志一千五、六百部。哥伦比亚大学也有一千多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方志目录，著录一千五百多部。此外，华盛顿大学也藏有方志五六百部。

1957年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吴德明编有《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反映了欧洲七个国家、二十五个单位收藏中国地方志总共二千五百九十部。著名的藏书单位有：英国大英博物馆，剑桥、牛津、伦敦各大学图书馆，法国国家学院、东方语专和亚洲学会等。其他如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各国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中国地方志若干部。

此外，加拿大温哥华的哥伦比亚大学、澳洲各大学、朝鲜汉城大学、新嘉坡大学、新嘉坡南洋大学也各自收购了不少的中国地方志。

总之，了解了中国地方志的源流、特征、史料价值以及收藏情况，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利用地方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